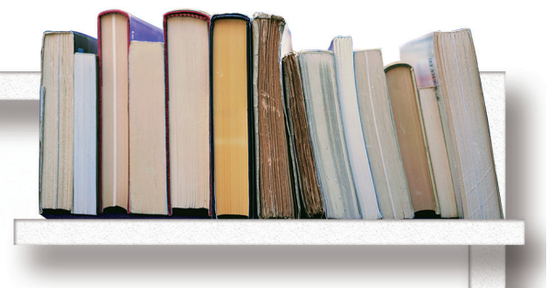
期刊·观察



影视的夏天冰火两重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随着一年一度的高、中考在6月相继落下帷幕,“暑期档”在大银幕、小荧屏上拉开帷幕,正式步入影视的夏天。在这个6月,影视剧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硬汉”题材遇冷,“女性”题材火热,

“阿汤哥,别扒飞机了!”63岁的汤姆·克鲁斯在新上映的《碟中谍8》中继续上演“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观众似乎不再像从前那样买账。《碟中谍》系列已经火爆了近30年,其最大的卖点在于“无特效、纯实拍”,用血肉之躯打造视觉奇观。在《碟中谍》系列中,阿汤哥的动作惊险程度与其年龄成正比:《碟中谍1》垂直威亚下降,《碟中谍2》徒手攀岩,第三、第四部高楼跑酷,《碟中谍5》时开始扒飞机,《碟中谍6》时开上了直升机,《碟中谍7》里开着飞机跳火车,到了《碟中谍8》,更是扒飞机、开飞机、跳飞机。但是影片的惊险程度并不一定与票房收入成正比,《碟中谍7》最终亏损约2500万美元,是该系列作品中首部亏损的项目。

63岁的“硬汉”汤姆·克鲁斯刚跳完飞机,71岁的“功夫巨星”成龙又带着《功夫梦:融合之道》走来,电影上演3天,票房不足500万元。两部动作片的相似之处在于,基本上靠叔叔辈演员打,票房命运也很相似。这也是近几年来很多院线动作大片的共同结局。《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认为,数十年过去了,这个时代不再欢迎“剧情简单”的动作大片了。更重要的是,时代背景变了。文章以《碟中谍》系列的高开低走为例说明:“《碟中谍》系列能拍到如今,穿越了多个电影工业发展周期,也足以证明阿汤哥的坚持。当年无论是《007》还是《碟中谍》都是在冷战时代背景下诞生的,其真正的核心是它部分满足了观众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无法追问真相的好奇心和遐想。但属于特工题材的时代早已过去,曾经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氛围消失殆尽,冷战视角下的两极对立不再是日常观众的核心。”

与“硬汉”题材遇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性”题材的火热。陈可辛导演的《酱园弄》从2023年立项以来就跻身话题度领跑的华语片行列。去年在戛纳非竞赛单元首映,今年6月被选为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片,并正式登陆院线公映。《酱园弄》电影有两部,第一部《酱园弄:悬案》以“民国四大奇案之一”为原型,将詹周氏与一众女性角色置于命运漩涡中心,呈现出民国时期的众生相。就像英文片名《she's got no name》暗示的那样,詹周氏之所以无名,正因为她身上浓缩了太多同样的悲剧:“自幼家境贫寒,没读过书,从被卖给人当丫头到冠夫姓,再到饱受丈夫欺凌,她鲜少有过选择的主动权,更别提为自己发声,只能活成那块见不得人的伤疤,和影片头尾画面里飘荡的微尘。”人民文娱以《时代夹缝中的女性互助》为标题评价该片:“相比于雕琢影片犯罪类型的外壳,《酱园弄·悬案》的剧本敏锐捕捉到了时代夹缝中‘女性互助’这一珍贵星火。电影中,作家西林在精神上唤醒了詹周氏,让原本软弱的她渐渐觉醒;而狱友王许梅教她识字读报,给她陪伴与引导,则让詹周氏感到被人珍重的温暖与甜蜜……”片尾有一个意象:觉醒的火在蔓延。毫无疑问,这是女性意识在觉醒。这个意象,也是《酱园弄》第二部的剧情走向。《南风窗》从“女性主义”萌芽、发展的角度,剖析了《酱园弄·悬案》热映的精神内核:“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处境。将其放在影片的背景设定下,便是女性千百年来遭受的苦难和压迫,和对此进行的反击,以一种澎湃、共同体连结的方式得到了申诉,在历史的皱褶处回响不绝。”

与《酱园弄·悬案》相呼应的,是由刘若英自编自导、谢盈萱主演的Netflix新剧《忘了我记得》。该剧豆瓣评分飙至8.3分,“中女代言人”谢盈萱继大热剧《俗女养成记》之后,依旧在新剧中上演着中年女子的困境和命题。《新周刊》刊文说,如果说《俗女养成记》的结局用看似圆满的婚姻塑造了中女童话,那么《忘了我记得》更像是写给东亚成年人的故事。“中女”除了年龄、职场危机,是否还有更多需要探讨的话题?许多看似平稳沉重的成年人,实则需要重建内心的秩序——直面与原生家庭的关系、衰老与死亡的课题。

总之,今年“暑期档”影视剧里的冰火两重天给人一个整体的印象:弱势群体,沉默的存在,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读书期刊

苏轼与陶渊明的精神共鸣

《博览群书》2025年6月号,月刊

在中国文学史的坐标系中,陶渊明和苏轼是两颗相隔六百余年时光的星辰。最新一期《博览群书》杂志刊发文化学者韩海安《陶渊明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一文,揭示了苏轼与陶渊明的精神共鸣。

文章认为,陶渊明与苏轼的对话,本质上是中国文人精神传统的延续与更新。苏轼在继承陶渊明美学范式的基础上,融入了宋代文化的新元素,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生命哲学层面。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决然告别官场的“樊笼”、回归自然的“田园”,用诗文构建起了士人精神归隐的经典范式,成为后世文人心中向往自由、摆脱束缚的精神旗帜。苏轼在其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中,多次化用了陶渊明“田园将芜,胡不归”这一经典意象,在曲折中寻找内心的宁静与自由。陶渊明热爱田园生活,将自然视为心灵的归宿。苏轼同样钟情于自然,他的诗词中自然意象丰富多样,山水、花鸟、明月等自然景物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二是诗歌美学层面。陶诗以“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评语)著称,其语言风格质朴自然,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含着深厚的韵味。陶渊明善于运用白描手法,用简洁而生动的语言勾勒出田园生活的场景与情感。苏轼继承了陶渊明的创作手法和美学特质,他的诗作常常能看到简洁而富有表现力的描写,更是主张“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三是艺术技巧层面。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传统具有一定的散文化倾向,他的诗歌常常以叙事的方式展开,如《归园田居》中对田园生活的描写,就像是在讲述一个个生活故事,语言质朴自然,不事雕琢。这种散文化的倾向为诗歌带来了一种真实、亲切的质感。苏轼进一步打破诗与文的界限,将“以文为诗”的手法发挥到了极致。在其《和陶饮酒二十首》中,既有陶诗的叙事性,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悟;又融入了宋诗的议论特质,在叙事的基础上,对人生、社会、历史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与议论。这种将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的创作手法,不仅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也使诗歌更具思想深度。

作者认为,苏轼在对陶渊明的解读与评价中,不仅塑造了陶渊明的文化形象,也借助对陶渊明的诠释完成了自我形象建构。在苏轼的笔下,陶渊明成了一种精神符号,代表着高洁、淡泊、超脱的文化人格。同时,苏轼在自己的诗词、文章中不断提及陶渊明,将自己与陶渊明相联系,表达自己对这种文化人格的追求与向往。苏轼的传播与塑造,使得陶渊明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文史期刊

由古至今看湖湘

《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6月下,半月刊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最新一期《国家人文历史》杂志,试图在有限的篇幅中系统梳理钟灵毓秀、人才辈出的湖湘大地。

要讨论中华文明起源,一定绕不开湖南常德。这座城市的地下埋藏着长达9000年的文化发展史。其长度、完整度在整个中国范围内都罕有其匹。至少在8000年前,澧阳平原的彭头山文化先民已开始栽培水稻;城头山遗址更是以发现中国最早城垣之姿被誉为“城池之母”。“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湖湘大地既是孕育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沃土,更凭西汉顶级织造—素纱禅衣和大唐“销冠”长沙窑瓷器扬名海内外。“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副岳麓书院文庙的对联,道出湖湘文脉的渊源有自。

湖南是中国革命的红色沃土。维新运动中,谭嗣同发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的呐喊;辛亥革命中,心忧天下的湖南人总是站在前列,全国各地爆发的武装起义中,几乎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谁敢横刀立马,看我湖湘青年。从新民学会发出“建党先声”,到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点燃工农革命的星星之火,在这片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建立工农革命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孕育中国共产党最早省级组织和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的热土上,湖湘儿女以敢闯新路的锐气、开天辟地的胆魄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英雄赞歌。

湖南人骨子里的“霸蛮”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基因,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强大的动力:橘子洲头、天心阁光影秀、坡子街派出所,不同风格、不同偏好的游客,总能在长沙找到打卡点;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十八洞村,用十多年时间走出一条中国式精准扶贫的新路,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

■文学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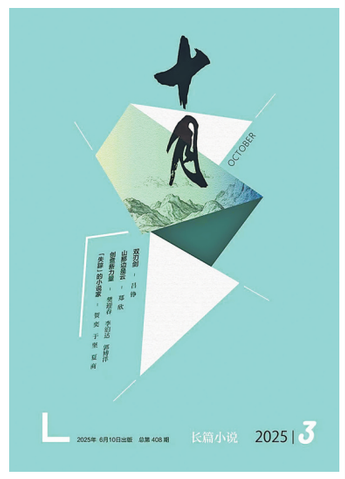
绘制动静相宜的贵州精神图谱

《十月·长篇小说》2025年第3期,双月刊

最新一期《十月·长篇小说》杂志刊发贵州作协副主席郑欣的长篇小说《山那边是云》。

《山那边是云》讲述了黄小小、陈洛迪、素瓦三位黔地女性漫长而复杂的生命交织史。名字中透露出三位女主人公的身世与性格:黄小小出身平凡,小小的女孩有大大的梦,她聪明、坚韧、有追求,为了变得优秀一路跋涉,咬牙坚持。陈洛迪洋气,她轻盈、从容、近乎完美,在这面镜子面前,黄小小所有的挣扎和努力都显得那么的笨拙、狼狈。素瓦是出生于贵州黎平、生来就会唱侗族大歌的侗族女孩。最终在黄小小和陈洛迪的帮助下,素瓦将侗族大歌唱响在法国的塞纳河边。也因为侗族大歌,黄小小决定不再和陈洛迪对抗,而是选择和心里的“对手”道别,三人各自收获她们种下的欢喜。

作家徐晓野在题为《越过山丘见云开》的评论文章中认为,小说通过对贵州山水之美、侗族文化之美、脱贫攻坚之美的艺术呈现,实现了自然美学、民族美学与现代美学的有机统一,为当代中国文学贡献了一部兼具地域特色和普遍意义的佳作。文章写道:“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上,贵州正以其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孕育出别具一格的文学表达。作家郑欣的长篇小说《山那边是云》恰如一部多维度的美学文本,在层峦叠嶂的黔贵山水间,在侗族大歌的悠远回响中,在脱贫攻坚的时代叙事里,构建起一个意蕴丰赡的文艺世界。这部作品通过文学博士特有的学术视角与艺术敏感,将‘山’的厚重与‘云’的灵动转化为一种精神意象,绘制出一幅动静相宜的贵州精神图谱。”



“风中”的历史记忆与山乡巨变

《民族文学》2025年6月号,月刊

新疆塔城的老风口是著名的“魔鬼风区”区域。最新一期《民族文学》刊发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长篇小说《赛坎的老风口》,讲述了老风口防风治理的故事。

“每天都是这样,赛坎用过早餐,出门前,第一件事就是在腰上系上他最看好的羊毛手工绳子。”小说这段话中的“羊毛手工绳”,实则是当地人“腰上系绳子”的生存哲学:无论是腰系绳索攀高观测研判风级、骑马传达讯息的原始抗风预警,还是在狂风来临之时把自己绑起来——这些第一时间落实自救的举措,都是赛坎记忆中的真实生活。同时也暗示了男主人公赛坎的身份:老风口的“预警者”。作为一名哈萨克族人,在他身上凝聚着一名老风口人遵循的生存观以及对自然的辩证认知,既承认“老风口的狂风太残酷”,又坚信“风实际上不是什么坏东西”。这为后文将老风口的狂风用于风力发电埋下了伏笔,这种转变不仅是对自然暴力的规训,更是生态认知范式的更新。和赛坎的硬汉形象形成互补的是他的妻子娇丹。娇丹真诚对待每一个生命,接纳每一份善意,对生活充满感恩之情。作为一名“民间大夫”和接生员,她喜欢帮助他人,甚至于“这个方面有瘾”,她通过接骨术和接生手法成为民间医学的传承人和生命延续的象征。

文学博士苏涛认为,相较于改编剧《我的阿勒泰》中对于新疆风景油画般精美的呈现,阿拉提·阿斯木笔下的新疆则有广袤的大地、狂风漫卷的黄沙、晨起喝的热奶茶、香腾腾的烤包子、用来待客的手抓饭……阿拉提·阿斯木在细节之处,为这些日常化情景赋予了生活气息和地域性。

作者认为,《赛坎的老风口》以鲜活的人物群像、独特的语言技艺,以及朴素真挚的情感,在自然生态与人文传统的交织中书写出了一部关于历史记忆与山乡巨变的生命史诗。

非马其人其诗

《书屋》2025年6月号,月刊

最新一期《书屋》杂志“书屋讲坛”栏目刊发了诗人非马的诗论文章及作家朱小棣对非马的介绍文章。

诗人非马原名马为义,1936年出生于宝岛台湾,童年随家人迁回原籍广东潮州乡下,上世纪60年代初期赴美留学。现代诗的写作与翻译,是其一生的兴趣与追求。非马现已出版二十几本诗集(包括英文诗选)、三本散文集,还有多种译诗及译文选集,其作品被收入一百多种选本中,此外还有作品被译成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马来语、希伯来语、法语及罗马尼亚语等语言。非马和他的诗作在海峡两岸以及美国华人社群中颇具影响力。作家朱小棣认为,非马先生的现代诗创作,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从诗艺的角度,诗人从简单叙事到真实抒情,再到靠形象创造意境,跨越了三级台阶;从语言角度,诗人从汉诗英译,逐步走向双语交替原创,大部分生涯优先用汉语写作。非马将近七十年的创作与积累,使得诗歌写作完全融入了他一辈子的生活,其诗作已不仅仅具备文艺价值,更是包含着很大的能量和原动力——既是诗歌艺术的常青,又是生命意义的体悟。

非马《诗人与后现代》的诗论文章,则从后现代主义这一现代诗歌流派出发,谈及他对现代诗的基本认识:一、求新是一切艺术的原动力。后现代诗的许多特征,多多少少都与求新求变有关,如果运用得当,可使诗的表现方式变得多彩多姿;二、不独创便没有艺术。作为诗人,面对前人或自己使用过的意象,如果没有新意或超越,最好避免重复使用;三、诗必须是诗。诗是诗,不是散文、小说,倘若把文类的界限打破,做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成为四不像;四、写诗是有意义的行为。一首诗并不仅有一个意义,有多少读者便有多少意义;五、形式与内容必须紧密结合。现代诗的形式应该随着诗的内容而定,必须永远同内容紧密结合。六、诗人是快乐的。一个富有人道精神的诗人,即使是创作有关人类苦难的诗,在完成作品后,诗人的心里一定会感到一种糅合着超脱、提升、希望与成就的愉悦。

蛇在中国语境中的神话象征

《文史知识》2025年6月号,月刊

最新一期《文史知识》杂志刊文,盘点了蛇在中国神话语境中的三重象征:力量、变革与丰饶。

首先是力量。文章认为,在中国文化谱系中,蛇是龙的原始形态。两者之间的文化关联,可追溯至上古神话的深层结构:伏羲与女娲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创世神,其形象为人首蛇身——伏羲执矩推演八卦,以几何秩序诠释天地法则;女娲炼石补天,以母神之力重构宇宙平衡。二者蛇躯交缠的造型,不仅暗喻阴阳交泰的创生逻辑,更将蛇的蜿蜒形态升华为贯通天地的宇宙模型。古代人对蛇的崇拜为后来的龙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其次是变革。蛇的生物学特性,例如水陆两栖的生存能力、周期蜕皮的特征,被抽象为生命再生和自我变革的象征。道家经典《抱朴子》说“蛇有无穷之寿”,认为众多动物中惟有蛇的寿命最长,享无尽之期。蛇通过蜕皮实现的生命更新,恰似修行者通过内丹修炼突破肉身桎梏的具象化表达。这在本质上是在模仿蛇的“蜕形”智慧:每一次旧壳的剥离,都是对过往自我的涤除,更是向“形神俱妙”境界的跃进。这一思维模式,承载着古人超越生死轮回的终极渴望。

再是丰饶。作者写道,在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中,蛇因与水和土地的密切联系,被视为自然力量的化身及丰饶的守护者。民众认为蛇能呼风唤雨、护佑农田免受灾害,同时兼具驱邪避疫、守护村庄平安的功能。这种信仰不仅体现了对自然威力的敬畏,更反映了农耕文明中对风调雨顺与生活安泰的渴求。